

## NGO 需要支持和帮助

金亮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NGO恐怕是一个陌生的词汇。然而,在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艾滋病防治工作中,NGO已经成为一支不可缺少的力量。

在国际上,很多国家都非常推崇NGO,而NGO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泰国和柬埔寨就是这样。泰国是亚洲第一个艾滋病流行被逆转,即感染率下降的国家,柬埔寨是第二个。在这两个国家,NGO在安全套推广、同伴教育、同性恋人群的行为干预、对感染者的社区关怀等工作中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柬埔寨,安全套推广完全是靠NGO完成的。

世界卫生组织中国代表处协调官赵鹏飞教授强调,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在预防控制艾滋病方面,NGO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NGO虽然是非政府力量,但是,它与政府并不是对立和排斥的关系,而是一种优势互补的关系。北京爱知行健康教育研究所所长万延海强调,民间

# NGO 艾滋病防治不可忽视的力量

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简称NGO。这种组织的行为不是政府行为,不代表政府的意志和政策导向,政府对其活动可以支持,也可能仅仅是有所联系。

在防治艾滋病的斗争中,世界各地的NGO做了大量的工作,成为一支不可缺少的力量。

在我国,在艾滋病防治工作中,同样活跃着NGO的身影。世界艾滋病日前夕,本报记者采访了几家NGO组织,让我们一起去走近NGO,了解NGO在艾滋病防治工作中所作的努力和贡献。

——编者



“山西迎春花互助小组”的咨询热线就设在这间窑洞里。图为该互助小组的负责人(左一)与为他们提供帮助的北京爱知行健康教育研究所的工作人员一起研究工作。张建国摄

本报记者 金亮 张建国

### 洋味十足的NGO

除了像“迎春花”这样充满泥土气息的NGO,还有一些洋味十足的NGO也在尽心竭力地为艾滋病防治事业工作着。法国无国界医生组织就是这样。他们与广西壮族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于去年12月1日合作开设了艾滋病门诊,免费为南宁地区的艾滋病患者提供治疗。

这里有6名医务人员,其中3名来自国外。这里使用WHO推荐的治疗方案,药物全部从国外进口,费用由无国界医生组织承担。截至今年9月,该诊所登记在案的患者共有180人,其中110名达到治疗标准的患者正在接受抗病毒治疗。据介绍,该诊所今年年底前,要为200-250人提供免费抗病毒治疗。

该诊所不仅提供药物治疗,同时还组织几名感染者作为志愿者,为其他患者和感染者提供关爱服务。在该门诊采访时,记者遇到一名40岁左右的男性患者,他就是一名志愿者,经常到门诊部给其他患者和感染者提供咨询,包括心理和情感方面的交流、疏导。像他这样的志愿者,这里共有三位。

### 做出令人瞩目成果的NGO

11月26日,一个名为《M SM人群预防AIDS行为干预方式研究》的报告正式面世(M SM指男性与男性之间的性行为)。据了解,这是我国第一次针对M SM人群进行的这样大规模的研究。

这项研究由北京纪安德健康教育研究所策划并实施。该研究所是一个非政府组织,工作内容主要围绕性别与健康、科学与教育展开,在M SM人群中进行预防艾滋病的行为干预是其最主要工作内容之一。

该研究所成立于2002年,但他们的工作从1997年就开始了。他们开通的99575北京“同志热线”除了面向同性恋者提供热线咨询外,还在酒吧、浴池等场所发放安全套及相关宣传材料。他们是最早在中国开展同性恋人群艾滋病干预工作的组织。

此次完成的这项研究,可以说是北京纪安德健康教育研究所的一个大手笔。这个项目历时一年,以不到8万元的有限资金,获得了25万字的研究成果。该项调查工作完全是由同性恋人士实施,由于是“自己人研究自己人”,因而该研究表现出了独到的视角和观点。该项目不是针对同性恋的研究,而是研究在M SM人群中什么样的预防艾滋病的行为干预方法效果最好,因此,他们对不同的行为干预方式进行了深入分析。

虽然这份研究报告只是作为内部资料出版,但其成果却令人瞩目。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等中外相关机构的专家学者对这个研究均给予高度评价。世界卫生组织驻中国代表处协调官赵鹏飞教授称赞该研究是一项“推动性的工作”。

### 热心帮助其他NGO的NGO

提到那些为预防控制艾滋病辛勤工作的人们,不能不说说北京爱知行健康教育研究所所长万延海。他于1994年开始组织“爱知行项目”,2002年成立北京爱知行健康教育研究所(以下简称“爱知行”)。由于十年来一直致力于艾滋病防治工作,因此,无论是在中国还是海外,万延海都可以称得上是“知名人士”。

“爱知行”的一项重要工作是艾滋病相关的信息收集整理和交流,即系统地收集每个地区的艾滋病相关信息,每周出一份信息简报。在此基础上,“爱知行”对当前的政策法规以及一些涉及艾滋病患者

### 充满泥土气息的NGO

“山西迎春花互助小组”的“办公地点”设在互助小组发起人之一老李(化名)家的窑洞里,12名骨干每天在这里轮流值守电话,而拨打这个电话的,全是艾滋病患者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迎春花互助小组”成员除了为咨询者解答问题,需要的时候还要上门服务,少的时候两三天出去一次,多的时候每天都要出去。

“迎春花”有12名骨干,都是艾滋病患者或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他们从1998年开始,自发关爱感染者。

几年来,他们骑着自行车,到各村的艾滋病患者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家里宣传艾滋病知识,结合自己的治疗经验,解答患者有关治疗的问题,提供有关医学信息。为了不引人注目,他们去各家走访的时候,往往是以走亲访友为名。

村民老李(化名)曾经卖过药,老李第一次去

### 防治艾滋病不能忽视NGO

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会长戴志澄教授对记者说:“我们这里是中国艾滋病预防控制方面最大的NGO。”从1993年成立至今,该协会创办了《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杂志,组织召开了中国NGO预防控制艾滋病工作联席会议,拍摄了防治艾滋病电视宣传片,举办了艾滋病科普展览,沿铁路线开展了艾滋病防治宣传活动,开展面向感染者的关爱工作和高危人群的行为干预工作。戴志澄自豪地说:“很多国际会议都要我们去参加,我们这个组织代表了中国的NGO。”

戴志澄说,国外非常重视NGO的作用。在国外,有诚信的NGO的社会影响力很大,所以国外现在特别关注NGO,有一半的工作都要交给NGO去做。在艾滋病的高危人群中,有些行为如卖淫、吸毒是非合法的,政府部门与这类人群进行沟通难度较大。再如同性恋,这个人群十分封闭,由政府出面到这类人群中去开展工作,难度更大。而NGO没有政府色彩,比较容易接近这些特殊人群,因此,NGO在这方面有着自身的优势,可以做很多政府难以做或不便做的事。此外,NGO运作非常灵活,不需要层层审批,因而效率较高。

爱知行研究所所长万延海说:“一些不确定的领域政府不适合介入,说‘是’或者说‘否’都太沉重了。在这些需要尝试的探索性领域,就应该由民间组织去做工作。”

戴志澄强调,在艾滋病的预防控制工作中,不能忽视NGO的作用。世界卫生组织驻中国代表处协调官赵鹏飞也指出,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目前在预防控制艾滋病方面,NGO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 没有享受应有待遇

德健康教育研究所成立于2002年,至今没有稳定的资金来源,大部分资金都来源于志愿者捐助,所以基本上是有项目才会聘一些专职人员,没有项目的时候就靠志愿者抽时间做工作。研究所在北京一个小写字楼里租了一间不到20平方米的办公室,专职工作人员有两个,每月工资仅几百元。所长郭雅琦说:“我们工作的目标人群是社会不认可的边缘群体,所以获得资金比较难,这么多年的工作都是靠志愿者在幕后默默无闻地做着奉献。”

郭雅琦坦言,资金问题阻碍了他们的发展。因为没有稳定的经费支持,便难以建立稳定的队伍,而完全靠志愿者工作有很大的局限性,人员的不稳定性和工作的长期稳定性之间的矛盾十分突出。

另外,注册难也是中国的NGO遇到的一个大问题,很多民间组织没有真正意义上的NGO的名分。

在中国,NGO作为社会团体应该在民政部门注册,但是有种种条件限制,比如必须有主管单位等。因此,很多

### 电子信箱

- 本刊主编: 赵笑梅
- 副主编: 耿彪
- 编委: 耿彪、赵笑梅

致力于艾滋病防治工作的NGO在中国已经越来越多,他们所做的工作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但是,NGO在发展过程中也遇到了不少问题。经费不足和注册难,是所有被访者一致提出的两大问题。

我们应该给NGO更多的支持,给他们创造更宽松的环境,给他们提供更多的资助,让他们更好地发挥作用。因为预防控制艾滋病不能没有NGO。

民间组织,包括“纪安德”、“爱知行”等,都是在工商部门注册的。NGO做的是公益事业,是没有利润的非营利性机构,但是,既然在工商部门注册,就成了企业,就要交税。像“纪安德”获得的“M SM人群艾滋病干预项目”资金本来就只有8万元,交了税以后就少了近一万元,因此,很多志愿者参与这个项目完全是凭热情,一分钱的报酬都没有。郭雅琦说:“我们做的是NGO该做的事,但是没有享受NGO的待遇。”

没有名正言顺的“身份”,使得众多NGO的处境颇为尴尬,难以充分发挥作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政策研究所所长李说:“市场和政府都有失灵的时候,这个时候就需要公益性组织发挥作用。很多领导干部经常说,某某事情需要国家、社会、个人共同参与,‘社会’指的就是这块。但是如果制度上不提供这个空间,你让他怎么做?”

## NGO 没有享受应有待遇

郭雅琦说:“NGO是政府联系社会的一个桥梁,但在我国,政府和NGO的关系还没有理顺,很多政府部门认为NGO都是和政府作对的,尤其是那些真正意义上的NGO。我觉得这种担心有一定的理由,但是没有道理,因为他们对NGO缺乏了解。”

万延海说,目前政府事业单位完全由政府拨款,一些事业单位仍然是大锅饭,很多人不做事,如果社群组织也可以加入,就可产生竞争机制,这些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另外,政府如何面对来自NGO的批评也值得重视,一个开明的政府应该鼓励人们批评自己,而不能给敢于批评自己的人“穿小鞋”。

世界卫生组织驻中国代表处协调官赵鹏飞告诉记者,今年他们与中国政府有关部门联合做了一个关于中国艾滋病情况的评估报告,其中就提到了中国的NGO在注册方面的困难和经费不足,以及能力不足、参与有限等问题。报告建议加强NGO的建设,在适当的时候改善法律、法规,使它们能更好地开展工作。

文/金亮 张建国

陈凤霖 百岁一岁的付爱英

说话风趣逗人笑

苑西制药协办

仲景牌六味地黄丸 豫药广审(文)20031230360号